



深切怀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各界人士瞻仰毛泽东同志遗容

参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纪念室，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顾委、中纪委、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也前往瞻仰参观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日。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彭真等与首都各界人士3,000多人，怀着崇敬的心情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同志的遗容，对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表示深切的怀念。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各界人士还参观了设在毛主席纪念堂内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纪念室，缅怀他们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南侧庄严巍峨的毛主席纪念堂，自1977年9月9日开放以来，已接待了980万来此瞻仰的群众。今天，纪念堂南边广场上标志着祖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面红旗，在灿烂的阳光下面迎风招展。纪念堂内北大厅正中毛泽东同志的汉白玉坐像周围，是长青的松柏和盛开的鲜花，坐像前摆着来自祖国南方的花束编成的9个花篮，象征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9个花篮的敬献单位是：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妇联联合会，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

上午9时起，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陆续来到纪念堂内毛泽东同志的坐像前肃立致敬。接着，他们走进瞻仰大厅，瞻仰了毛泽东同志的遗容。

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纪念室里，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界群众仔细参观了展出的文献、实物和图片。他们缅怀四位老革命家的革命业绩，回顾半个多世纪来中国革命的战斗历程，更加激起了对四位老革命家的敬仰和怀念。

前来瞻仰和参观的中央领导同志和各方面人士还在纪念堂内观看了纪录片《光辉永恒》。这部影片生动地记录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革命斗争事迹的片断。

黄文欢同志今天上午也到毛主席纪念堂向毛泽东同志的坐像献了花篮，瞻仰了毛泽东同志的遗容，参观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纪念室。

今天前往瞻仰毛泽东同志遗容并参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纪念室的还有：

中央政治局委员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方毅、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胡乔木、倪志福，候补委员姚依林、秦基伟、陈慕华；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胡启立、候补书记乔石、郝建秀；

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常委王平、伍修权、江华、肖劲光、宋时轮、陈锡联、段君毅、耿飚、姬鹏飞、黄火青、程子华；

中纪委常务书记王鹤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许德珩、彭冲、王任重、史良、朱学范、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赛福鼎、周谷城、严济慈、胡愈之、



荣毅仁、叶飞、廖汉生、韩先楚、黄华；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国务委员张劲夫、张爱萍、吴学谦、王丙乾、宋平；

中央军委委员洪学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易辰；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康克清、季方、庄希泉、胡子昂、王昆仑、钱昌照、吕正操、周建人、周培源、包尔汉、缪云台、邓兆祥、费孝通、赵朴初、叶圣陶、屈武；

下午，瞻仰毛泽东同志遗容并参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纪念室的首都各界人士中，有各条战线的先进模范人物，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中央党政军机关的负责人。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今天上午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泽东同志的遗容，参观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纪念室。

前往瞻仰毛泽东同志遗容并参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纪念室的有：

中共中央委员 于明涛、王洪恩、王汉斌、王兆国、王崇伦、邓稼先、吕培俭、朱云谦、朱光亚、朱穆之、伍精华、华国锋、刘震、刘志坚、刘复之、江泽民、许家屯、孙大光、严东生、李锐、李东治、李梦华、李绪鄂、李锡铭、李耀文、杨波、杨泰寿、杨德中、何康、何东昌、沈图、张寿、张震、陈彬、陈希同、陈福汉、陈璞如、林丽樞、罗青长、周子健、周建南、赵守一、赵苍璧、胡绳、姚广、贺敬之、秦川、秦仲达、袁宝华、莫文祥、热地、钱正英、钱永昌、高扬文、郭力文、唐克、黄新廷、崔乃夫、崔月犁、梁必业、穆青；



王昆仑、缪云台、胡厥文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瞻仰毛泽东同志遗容。新华社记者摄

中央候补委员 尉健行、罗尚才、周光召、郑光迪、姜爱生、李刚、胡锦涛、蒋心雄、赵宗鼎、唐仲文、朱训、陈焱、林股才、梁栋材、魏一鸣、卢良恕、邹竞蒙、张辛泰、钱其琛、刘鸿儒、王忍之、刘国光、黑伯理、韩叙、谢非、李淑卿、吴祖强、何光远、张祥、聂奎聚、黄枢、王学珍、刘友法、汪家镠、张伯祥、张万欣、安志文、吴蔚然、林润青、邹家华、罗干、马卫华、赵东宛、吴向必、高厚良、刘维明、钱学森、马洪、房维中、徐信、马明、王六生、杨永良、吴冷西、李瑞山、于桑、汪东兴；

中顾委委员 万毅、王子纲、王幼平、方强、孔原、甘渭汉、平杰三、冯文彬、冯纪新、成钧、成仿吾、任质斌、刘建章、刘道生、刘景范、江一真、杜义德、杜星垣、李达、李贞、李强、李一氓、李志民、李运昌、李葆华、李颜伯、李聚奎、吴德、吴克平、吴富善、汪锋、宋黎、宋佩夫、张苏、张策、张平化、张达志、张光年、张邦英、张秀山、张穆夫、陈野苹、武新宇、范式人、林铁、罗玉川、金明、周扬、周林、

赵辛初、赵武成、赵健民、赵敏毅、贺晋年、袁升平、袁任远、夏之栩、顾卓新、贾庭三、高克林、郭化若、郭述申、郭洪涛、黄镇、曹瑛、曹里怀、章缙、阎要、彭嘉庆、彭德清、韩念龙、程世才、曾三、雍文涛；

中纪委委员 马国瑞、王焰、王又新、王从吾、王曙光、王福庆、王鹤峰、文正一、史敏、白治民、包玉山、乔乔、任志恒、刘英、刘昆、刘汉生、刘自德、刘鸣九、刘家栋、刘茹影、刘新权、刘鹤孔、孙彤辉、李庄、李昌、李耀、李之璇、李正亭、李君彦、李哲夫、李健民、李振海、杨克、杨廷、杨子谦、杨蕴玉、吴信泉、余建亭、狄子才、宋诚、张矛、张凯、张顺、陈坦、陈达之、陈如龙、邵井蛙、林一心、金石、庞然、赵起扬、饶正锡、徐深吉、高峰、高新华、郭建、唐延杰、浦安修、黄凯、黄乃一、黄民伟、黄立清、曹广化、曹冠群、戚元靖、梁茂成、彭儒、彭清云、韩光、韩天石、焦若愚、焦善民、蔡顺礼、谭安平、蹇先任、蹇先佛；

(下转第四版)

西哈努克和乔森潘瞻仰毛主席遗容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今天是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副首相乔森潘由外交部顾问韩念龙陪同，上午前往毛主席纪念堂在毛主席坐像前献花篮，表示敬意和怀念。西哈努克亲王和乔森潘副首相还瞻仰了毛泽东同志遗容，参观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纪念室。

民柬联合政府总理宋双已于昨天离京回国。



首都工人、少年儿童和各族代表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大厅，向毛泽东同志致敬。

本报记者 王景仁摄

开阔视野 打破框框 大步前进

用技术进步回答新的挑战

上海机电行业提出要有『超前』精神

本报讯 上海机电工业正面对着一次新的挑战，这就是：各行各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要求上海机电工业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在技术进步上来一个“超前”，以更好地适应其他行业的要求。

上海机电行业今年生产形势很好。前11个月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1.1%；利润增长15.89%；上缴税利增长15.13%。产品适销对路，全年销售实现率可达99%以上。截至12月22日，已按期完成全国61个重点工程所需要的机电设备生产任务。1984年的生产任务也已基本吃足。

但是，现在也存在着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潜在危机：机电工业的技术进步既跟不上“向外挤”的需要，也跟不上各行各业技术改造的要求。这几年，上海机电工业虽然也搞了一些革新、改造，但大多数用于改善生产条件，扩大短线产品生产；而真正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使生产技术有较大改进的并不多；产品的水平还不能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据机电一局今年4月统计，全局3,100种主要产品中，属于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的产品，仅占11%。

目前，“出口出不去，进口挡不住”的局面仍然存在。上海机电工业历史久，技术好，配套齐全，在国内占有一定技术优势。但是这几年，

不少外地企业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快了技术进步，上海的部分优势正在失去。据机电公司对印刷、橡胶、轻工机械三个行业55个主要产品的调查分析，处于“上升期”的占38%，“稳定期”的占36%，“下降期”的占26%。问题还在于：在国际、国内生产技术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如果不抓紧技术进步，所谓“上升期”、“稳定期”的产品，也有可能迅速转入“下降期”。

为了争取主动，上海机电一局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有计划有步骤地抓主要产品技术改造，从而带动其他产品。今年机电一局组织400人花了8个月时间，对全行业12,000个品种一一进行清理，划出了800个为关键性品种，当前首先要保证这些产品在质量上

有一个大的进步。整个行业已开始对准这个目标集中力量攻关。

对于开发新产品，采用新工艺、新技术，该局注意总结现有的成绩，鼓舞人们奋发向前，致力革新，不断取得新成就。例如钢球厂，三年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推行新工艺，两次改进冲压模具，使冲压寿命提高5至10倍，经济效益提高。上海电缆厂经过两年努力，使4个品种、66个型号、5,118个规格的产品全部达到国际标准，出口任务大增，供不应求。对于上述厂的做法，机电一局及时进行了推广。通过典型引路，人们开始认识到，搞技术革新，必须站得高，看得远，不能抱残守缺，满足现状，必须具有“超前”精神。

把科研成果尽快应用于生产

西安电子仪器厂 组成生产科研联合体

本报讯 记者雷润明报道：科技力量薄弱的西安电子仪器厂和西安电源学会自愿组成生产科研联合体后，经济效益显著提高。这一新的技术经济组织正引起西安科技界和经济界人士的注意。

西安电子仪器厂是1975年由几名家庭妇女和待业青年办起的小厂，没有一个技术人员。1978年，因为原来生产的干电池质量差没人要，开发新产品又没技术力量，工厂陷入了困境，工资发不出，还欠债七八万元，一年停产达八个多月之久。严格的现实使工厂领导认识到了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性。

1979年，和这个厂生产技术密切对口的西安电源学会成立了，但因缺乏经费，也没固定活动场所，不能展开正常活动。西安电子仪器厂知道后，主动找到电源学会。经过协商，双方签订了结成生产科研联合体的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是：一、电源学会设在工厂，由工厂提供开展活动的必要条件和一定的活动经费。二、学会优先为工厂提供技

术咨询和引进新的科研成果。工厂缴纳科技成果转让费和技术咨询服务费。

西安电子仪器厂和西安电源学会联合三年多来，收益甚多：

第一，企业产品不断更新，在市场上具有了较强竞争力。现在这个厂生产的大部分产品由西北无线电公司包销。

第二，提高了经济效益。联合后，仪器厂当年就还清了外债。今年1至9月已盈利10.7万元，预计到年底可实现利润14万元。

第三，提高了职工技术素质。学会千方百计为工厂培训技术力量，工厂初步有了自己的技术骨干队伍。

第四，加快了科技成果向生产领域的转移，使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1981年，学会了解到国外电子行业出现了一种新导热器件，就及时组织力量加速研制，仅半年时间就使新技术应用于生产。

第五，促进了电源学会工作的开展，使之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超前』精神赞

本报评论员

在全国的机电行业中，上海无论在技术上、工艺上、产品质量上、市场竞争能力上，都居于领先地位。今年头十一个月与去年同期比较，利润增长15.89%，上缴税利增长15.13%，而且1984年的生产任务已基本吃足。可谓有“柴”、有“米”，有钱花，一派好光景！然而他们没有以此为满足，而是预感到了新的压力，提出要在技术进步上要有“超前”精神。

提出“超前”的根据是什么呢？两条：一条是，各行各业都在搞技术进步，机电行业必须加快步伐，走到别人的前面，这是机电行业自身性质和任务决定的，第二条，“出口挤不出，进口挡不住”，暴露出自己虽然在国内外有领先的优点，但在国际市场上却缺乏竞争能力。放眼世界，原来已有那么多国家跑到前面，环顾国内，不少同行又在纷纷奋起。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下棋还讲究要看三五步，难道领导现代化的企业，就不需要这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吗？上海机电行业看到了这两条，他们才提出以“超前”精神迎接挑战。这种精神状态，是很值得赞许的。

说现在企业面临新的挑战，有两种含义：一是从国内来看，同行业竞争已是客观事实，原材料提价，工资增长，一些企业越来越被动产，一些被称为“摇钱树”的工厂，曾几何时，摇不下来钱了。这些企业如何从困境中走出来，就是迎接挑战。二是从国外看，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一日千里，过去说科学技术对生产的影响是十年一小变，现在是三年一大变。一些经济技术发达国家的企业，正在把材料、劳动密集的产品转化为知识、技术密集的产品，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光导纤维等正在对人类的进步产生巨大影响。我们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四化建设中，怎样赶上别人？

看来重复别人的老路，什么都从头做起，是不行的。在某些方面，争取跳过一些阶段，有急起直追，也要有迎头赶上。在八十年代的今天，只学习和引进六十年代水平的东西，到头来，很可能会与别人又拉开新的差距，这又是一种挑战。在某种意义上说，后者较之前者更重要。无论迎接哪种挑战，上海机电行业提出要有“超前”精神，都是必要的。

现在有些企业的领导者，正是缺乏这种“超前”精神，缺乏改革者的勇气和魄力。有些企业为什么日益盈亏，由先进变后进？除了客观因素外，不是与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满足现状的精神状态大有关吗！不是与缺乏“超前”的精神分不开吗！

提到“超前”，有人可能会想到“大跃进”，说那时不是很“超前”吗？其实这根本是一回事。科学的预见和脱离现实的空想是两码事。用科学的预见指导实践，与用盲目的大话代替现实，是水火不相容的。积极的进取精神，不论在什么时候、干什么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邓小平同志在一次题词中写道：“面向四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可惜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办事情想问题都没有跳出自己周围那个小圈子，对迎接新的挑战缺乏自觉性和紧迫感。

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各行各业在新的一年里怎样迈出新的步伐，开创新的局面，上海机电行业的“超前”精神是值得借鉴的。



安徽今年水产品总产量创历史新高

安徽省渔业生产今年获得大丰收。水产品总产量预计可达二亿四千万斤以上，创历史新纪录。

目前，安徽各地正值捕捞季节。到一百多斤，全省已捕捞鲜鱼一亿九千五百多斤，比去年的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渔民们正争先恐后地进城向国家出售鲜鱼。市上的价格有时低于国营水产公司牌价。

陕西制造出一种新型粮食专用车

经过在一种新型的罐式颗粒粮食运输车，最近在新安通过鉴定。

这种新型罐式颗粒粮食运输车，具有良好的防潮、防腐、防漏和防污染的性能，粮食装填时能自动报警。车罐内装有温度计，可随时掌握运输中的粮食温度变化。

新型粮食专用车，是由陕西省西安机械厂试制的，它的样车在今年西安新汽车新产品展评会上，曾获优秀展品奖。

中国民航波音七〇七班机首航成都—拉萨航线

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七时三十九分，一架满载着成都起飞的，中国民航波音七〇七班机，于九时二十四分抵拉萨。两个小时，这架飞机又满载着成都起飞的，它于十二时五十七分抵成都。这是中国民航波音七〇七班机首航成都—拉萨航线。

今年全国已生产原煤六亿八千万吨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黄奉初）据煤炭工业部25日凌晨统计，今年全国统配煤矿原煤产量已达三亿五千六百万吨，提前7天完成了全年生产任务，比去年同期增长3.6%；开拓掘进进尺75.5万米，提前32天完成全年任务。连同地方煤矿一起，今年全国累计生产原煤6.8亿吨，提前12天完成全年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7.8%。

今年以来，煤炭系统经济效益比较显著。全国统配煤矿考核的33项主要指标中，回收效率和坑木消耗、商品煤含矸率等17项指标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

全国电力生产提前完成国家计划

全国电力生产提前10天完成今年国家计划。据统计，到12月21日止，全国已发电3,380亿度，比去年同期增长7%。

今年以来，全国不少地区雨量充沛，保证了

水电站多发电、满发电。到21日止为全国水电站计划多发电148亿度。

辽河油田扩建工程之一的茨榆屯新油田今天正式投入生产。

这个新油田目前已有65口油井投入生产，年产原油42万吨、天然气1亿立方米。茨榆屯油田是今年开始全面建设的。

（据新华社）

辽河油田茨榆屯新油田正式投产

进的设计和试验方法，使整车的性能、可靠性和寿命比老一代解放牌汽车有大幅度的提高，有的指标达到了国际上同类汽车的先进水平。

这几年，我国汽车工业打破地区、部门的界限，以经济合理和专业化分工的原则进行了调整改组，先后组建了7个汽车联营公司，全国的汽车厂由130多个缩减到37个。这样一来，企业的组织结构合理了，管理工作加强了，再加上技术引进、技术改造方面的一系列措施，我国汽车工业终于具备了开始起飞的条件。

目前的形势也很喜人，今年截至11月底，全国已生产汽车223,900辆，提前两个月完成国家生产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23.7%，实现利润、上交利润也比去年同期显著增长。

我国汽车工业起飞了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黄奉初）1983年，是我国汽车工业突飞猛进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的汽车工业经历了重大革新，开始沿着现代化的轨道起飞了。

目前，我国不限于制造普通客车、货车了，已能生产11个大型共300多个品种的国产汽车的内在质量有了可喜的进步。今年全国完成鉴定定型的新汽车104种，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新产品——解放牌CA141型5吨载重汽车。这种新型汽车，采用了国际标准，运用了国际先

进的设计和试验方法，使整车的性能、可靠性和寿命比老一代解放牌汽车有大幅度的提高，有的指标达到了国际上同类汽车的先进水平。

目前的形势也很喜人，今年截至11月底，全国已生产汽车223,900辆，提前两个月完成国家生产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23.7%，实现利润、上交利润也比去年同期显著增长。

因势利导，逐步发展新的经济联合体

陕西户县县长 吴孝先

当前，在日趋活跃的农村经济中，一种对农民群众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新事物——新的经济联合体正破土而出。我县已有各种类型的经济联合体600个，参加的农户1,870户，占全县总农户的2%，经营着种植、养殖、采集、加工、运输、烧窑、建筑、商业、饮食服务等20多个项目。对这种新的经济联合体，正确认识它的性质和地位，探讨和研究它的发展趋势，积极稳步地扶持它成长壮大，无疑是当前农村工作中一项重要任务。

（一）

经济联合体的出现，有其客观必然性。联产承包制的实行，为经济联合开辟了道路。仅仅一两年时间，农民中不少人有了大量余粮和不少余钱。另一方面，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力过剩已成为普遍现象。在这种形势下，农民很自然地要思考怎样因地制宜地开辟生产门路，扩大经营项目，向商品生产发展。

“两户”是经济联合的基础。随着家庭承包制的实行，首先应运而生的专业户、重点户。目前，全县“两户”已发展到7,729户，占总农户的8.9%。但是，“两户”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有的户有劳力而缺资金，有的有资金而缺技术，有的需要提供产前、产后的社会服务。于是“两户”中的一部分人便产生了从各方面进行协作和联合的要求。

（二）

我县出现的经济联合体，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

以资源和设备为基础，以解决生产资料 and 资金不足的生产性联合；二是以技术力量为核心，实行产、供、销方面的联合；三是技术性不很强的，以劳力为主的劳务性联合。有的是单项联合，有的是多项合作；有固定的联合，也有不固定的联合。

从所有制上看，有四种形式：

- 1、个体之间的联合。一般多是以能工巧匠为主组织起来，采取等股投股、带量从从业人员的办法，自产自销，自负盈亏。经营项目有砖瓦、石灰、缝纫、机修、饮食、木器加工等。
- 2、国家或集体同个体之间的联合。如蚕茧公司、奶牛公司以及供销社同农户在种植、养殖业上的联合等。联合的办法也不一。蚕茧公司的联合，体现在三个方面：管理人员与技术骨干由县办企业中抽调，工人主要从农村招收；大部分资金由县财政局贷款解决，少部分由群众投资；所得利润，企业留成后，提取一定比例按交售蚕茧量返还给群众。供销社与群众的联合，是以供销社提供资金或技术，包销产品，利润分成，大头归农户。
- 3、利润分成与集体的联合。如涝店公社与马营大队联办的蔬菜加工厂，由社队分摊投资46万元，管理人员和劳力由社、队按比例抽调。收入扣除税金、企业

留成和工人工资外，社队按比例分成。

4、跨行政区划的联合。有在县内跨社之间的联合，也有跨行政区的联合，如城郊公社西坡大队与广东省汕头市蓬下公社联办的“秦鸥联合经营公司”。

这种由劳动群众创造的经济联合，是适应现阶段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是农业生产上的一大进步。这样的经济组织，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对它的性质和地位，我们应当正确认识。

（三）

新的经济联合体既然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组织出现在广大农村，我们应当对它持什么态度呢？

要端正认识，而不应把它列入“另册”。

今天，由于“左”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有的同志对这种新的经济组织，尤其是对那些跨越行政区域的联合体，总是不放心；有的同志对在按劳分配为主的情况下，有一定比例的股份分红不理解。从工作上讲，我们还没有真正把新的经济联合体纳入自己的领导范围。

应当认识到，要提高广大农村现在还很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单一的经济形式是很不适应的；只有发展

多层次、多类型、多组合的合作经济，才能适应商品生产的需要。在不同生产类别、不同经济条件下，合作经济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按劳分配方式以及合作的方式和内容，都可以有所不同，保持各自的特点。我们应同对待社队集体经济一样，满腔热情地关心、扶持、帮助新的经济联合体。

要堅持自愿互利原则，因势利导。

我们肯定了经济联合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建设社会主义农业是有益的，但还不能以现在就能大规模地发展这种联合体。我们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稳定、完善家庭承包制，发展专业户、重点户上。对新的经济联合体的发展，只能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因势利导，以求水到渠成，而不能违背群众意愿，硬性组合。

要做好工作，而不能放弃领导。

有的同志对新的经济联合体采取不闻不问态度，任其自生自长。这是不对的。目前在新发展的联合体中，有的受市场调节，规模小时大时小，产品时多时少；有的只靠留本分利，不留或少留积累；有的技术落后，生产成本很高；还有的在资金、销路上存在一定困难。这些都需要各级领导、各个有关部门予以关注。要在经营项目、投资方向上给以正确指导，注意合理布局；在资金信贷、原料供应、技术指导上给以热情帮助。我们要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和总结群众的经验，解决好一些政策性和实际问题。只有这样，新的经济联合体才会健康地发展。



在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九十诞辰的时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同广大读者见面了。

毛泽东一生写了大量的书信，这些书信是毛泽东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信一般比较低级，不能象论著那样系统地完整地阐述问题，但是他的许多观点和想法，没有在下论中得到论述，只在书信中记载下来了一些；一些方针政策、理论观点的酝酿过程，在下论中往往不易见到，而在书信中却反映出来了。毛泽东生平某些方面，如学习生活、个人交往，以及他作为党的领导人的某些活动，在下论中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在书信中却有较多的反映。因此，毛泽东的书信，是了解和研究他的思想和生平的重要文献。

收入《书信选集》的372封书信，是从现已收集到的毛泽东的1,500多封书信和约200件具有书信性质和形式的电报和批示中毛泽东有称之作为“短信”中挑选出来的。主要是选那些有一定思想理论内容，论及重要的政治原则和方针政策的书信；同时也选了一些同党内同志、党外朋友、亲属、故旧等个人交往的书信。纯属具体工作布置、作战部署等方面的书信，一般都不选入。

已收集到的毛泽东书信，最早是1913年的，最晚是1976年的。《书信选集》以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为开卷篇，1965年9月25日《致邓颖超》为终卷篇。开编以前的书信数量不少，有内容的也较多，将来准备编入毛泽东早期著作的集子。“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书信很少，这次都没有选入。

由于过去长期处于革命斗争的艰苦环境，毛泽东的不少书信已经散失，特别是1921年至1935年期间的书信，现在收集到的很少。在《书信选集》中，1924年至1928年和1930年至1935年这两段时间的书信竟付阙如。继续收集毛泽东的书信，是今后仍要努力去做的工作。

毛泽东的书信，近年来陆续发表了一些，但编成专集出版，这是第一次。集子中的大多数书信也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毛泽东书信选集》的出版，对于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都有重要的意义。

《书信选集》的内容很丰富，涉及的方面很广泛，在一篇文章中把它的全部重要内容都加以介绍是不可能的，下面分三段时间就几个方面作一介绍。

一

1920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选入书信42封。

开卷篇《致蔡和森》和第二篇《致蔡和森》，是标志毛泽东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重要文献。这两封信，表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这时作出了决定性的选择。他否定了当时在中国进步青年中比较广泛影响的、也曾经验过他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否定了用和平的方法改造中国与世界等主张，认定中国应当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明确表示唯物史观是正在组建中的中国科学哲学的根据。当然，这两封信对某些问题的论述还有不成熟的地方，这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他一旦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就为不断地加深对这个唯一科学的革命理论的理解，并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而不折不挠地奋斗。

1921年至1935年间的书信，选入的只有几件，其中有的表达了重要的思想。例如，1929年11月28日给中共中央的信，提出“唯我党理论常识太低，须经常进行教育”，并要求中央寄给党内出版物和代购一批理论书。在当时戎马倥偬的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这样急切地提出提高党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问题，是很有见地的。

这段时间里书信最多的是1936年。这一年，是全党为实现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新的政治策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的关键的一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侵略威胁，毛泽东代表中国各阶级和红军，也写了个人的影响，给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人士以大量的书信，呼吁他们赞同中国各阶级的合作抗日主张，以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选入《书信选集》中的20多封信，仅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

从受信人来看，有宋庆龄这样的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继承者，有在国民党和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有进步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有国民党爱国将领和地方法力派，有在十年内战中多次合作的战友，还有国民党中权当关键者。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争取和团结的对象之广泛性。

毛泽东在信中慷慨陈词，晓以民族大义，竭诚呼吁团结抗日。例如，在给傅作义的信中说：“今之大计，退则亡，则存者；自相煎艾则亡，举国皆成则存。”在给冯玉祥的信中说：“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然地义。”

毛泽东在信中表现了无产阶级政党和政治家以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在不给前嫌旧恶的宽广胸怀和至诚恳切之心。例如，在记高桂滋的信中说：“转告敝戚，则前事消忘”，“当此国亡无日关头，鄙人等决不因小事而致分裂。区区爱国之诚，谅蒙贤者深察”。西安事变发生后，在给阎锡山的信中说，“陕变突起，事出非常。……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报复南京，愿与蒋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

这些书信，团结抗日是共同的主题，但在写法上各具特色。根据受信人的不同情况，从民族大义谈到私人交往，从一些人的现实态度谈到他们过去的历史，既有对一些人的支持和期待，也有对一些人的规劝和批评，信中倾注了极大的爱国热情，表现了为实现合作抗日的坚定信念。对蔡元培，毛泽东在信中首先追述了“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称先生之崇宏宏议”的往事，希望他积极支持团结抗日的主张，“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志，不但言言，

《毛泽东书信选集》介绍

冯 惠

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对过去曾参与革命活动而此时尚无团结抗日觉悟的那部分人，毛泽东在信中对他既有中肯的批评，又有热情的期望。信中说：“渴闻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对曾经进攻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当时又在西北参加“剿共”战争的主均，信中开头一句话就是：“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对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蒋介石，信中说：“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夫通之心，遭千秋之辱骂。”“问去何从，愿先生熟思之。”

毛泽东为争取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所写的这些书信，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语言生动，文字优美，堪称文情并茂之佳作。有的甚至可以作为范文，选入语文课本。

二

1937年7月至1949年9月，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书信比较多，共选入135封。

在这一时期中，毛泽东同党内领导同志和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有不少的通信，同志式地讨论和研究问题，论及一些重要的方针政策、理论观点、政治原则和党性修养等。例如：

1937年10月10日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就宣判一个犯了重罪的红将军一事，严肃地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1940年给肖向荣的信，说明了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的策略思想的形成过程。信中说：“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我已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关于这一部分加上了修改。”

1941年8月6日和22日给谢觉哉的两封信，指出了陕甘宁边区财经问题的规律性即决定点在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并指出在不发生大的突变的情况下，经济建设是边区各项工作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好办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毛泽东在1942年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是这些重要思想的具体进一步发挥。

1941年9月29日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的信，强调学习方针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理论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实际是“看大以来写的文件”。这封信是在中央政治局九月扩大会议期间写的，要求党的高级干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为全党的普遍整风作重要的准备。

1942年9月15日给何凯丰的信，强调大批翻译马恩列斯著作的重要性，信中说：“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百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著作，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苏并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外国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1944年8月31日给秦邦宪的信，阐述了一些重要理论观点。信中指出家庭的改造应当与革命群众运动联系起来，“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和农业、手工业合作社，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还提出“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这一重要论点。

1948年3月6日给刘少奇的信，将经验与政策的关系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信中说：“凡政策的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信中还总结了1947年某些地方在土改工作中所犯政策性错误的经验，强调指出必须制定更明确分明的正确政策。对政策作系统的说明和实行正确的领导方针，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防止发生错误和及时地纠正错误。

1948年8月15日给吴玉章的信，不同意提“毛泽东主义”，强调应当“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经验”。信中对“中国革命的经验”的说明，包含着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思想。

1948年10月26日给刘少奇的信，对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问题作了重要说明。信中说：“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并指出这种“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这是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关于限制与反限制斗争的论述的先声。

在这一时期中，毛泽东同党内外一些学术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和著名人士也有许多通信，真诚地同他们交朋友，平等地谈心和交换意见，热情地支持他们的工作，鼓励他们多接触群众，接触实际，帮助他们思想上的进步，并对学术、文艺工作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在哲学方面，对艾思奇著作的评价，谈到自己当时“哲学不够”，“还能作为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并对研究孔子、墨子、老子的哲学文章详尽地提出意见。在历史学方面，从何干之对民族史的研究谈到范文澜对

经学的批判，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谈到吴晗的《朱元璋传》。在文学艺术方面，谈到了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现代话剧，郭沫若的历史话剧，开创旧剧革命新生活的《逼上梁山》，艾青论秧歌歌的小册子，还谈到丁玲的特写，肖三的诗歌，等等。毛泽东强调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文艺创作，都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应当同现实斗争相结合。例如，他推崇范文澜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是“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的“头一次”，认为这种清算“必有大益”，“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他建议一位文学工作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他希望研究历史更要注意“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一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这“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他对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毛泽东对学术界、文艺界人士的这些通信，表明他对知识分子和学术、文艺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给予很大的注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作为一个革命家和思想家的面貌。

毛泽东给青年、包括他自己的孩子的几封书信中，向他们指出学习和工作的努力方向，期望他们健康地成长。1941年1月31日给茅岸英、毛岸青的信，强调青年学习科学的重要性，要求他们努力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主义，“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1946年1月8日给在苏联学习的五位青年的信，指出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鼓励他们在这方面努力。

毛泽东还有几封书信（如1938年10月30日《致柳夷》、1946年3月12日《致洪禹》等），对一些党员和干部反映的个人问题，如在入党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在审中受到错误的对待等，采取热情而严肃的态度，认真负责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体现出党的领导人对人的关心，待人的真挚，读来十分感人。

这个时期的最后一组书信，是中共中央1948年5月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以后，毛泽东写给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和其他著名人士的。其中有当时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沈钧儒，有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敬重的宋庆龄，有远在海外、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司徒美堂，等等。中共中央的号召和毛泽东写的有关的书信，得到了广泛的热烈的响应。1949年2月2日毛泽东给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6人的复信，反映了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空前盛况。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的书信保存下来的比较多，《书信选集》中收入了195封。

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毛泽东的一些亲朋好友纷纷写信给他。他的近亲毛家、文家、杨家的人，有他少年时代的同学、友好乡邻，有辛亥革命后他在湖南新军中时的同事，有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新民学会的会有，有他的老师，有烈士的遗属，还有湖南的社会名流，等等。他们在信中追叙旧谊，表示怀念和敬意，一些人 also 提出某些个人要求。国家初建，百废待兴，毛泽东担负着党和国家繁重的领导工作，但是对于亲朋好友来信，他都亲自答复。对他们怀着真挚的感佩，在一些信中中怀先烈，关心遗属；对生活有困难的人，常常用自己的稿费给以经济上的帮助；对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常常在信中关切地问及。他把同他们的通信和交往，作为联系群众、了解下情的一种方式。

对亲朋好友提出的一些个人要求，毛泽东从不利用他享有的权力加以特殊的照顾。例如，对要求他帮助介绍工作的老同志，他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加群众了解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热意即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对要求他帮助解决入党问题的旧友，他说：“入党事要在当地经过一定规定章办”，“未便率尔紹介”。对曾经照顾过杨开慧烈士的陈玉英的女儿的升学问题，他说：“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去问。能否考取，听凭学校。”他对自己的近亲要求特别严格。1949年10月给杨开智的信中说：“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他的近亲文家的人有了缺点，他不但亲自对他们进行教育，还写信给当地的组织，请他们帮助进行教育。1954年4月给湖南湘乡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信。一信中说：“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在处理亲朋好友反映的地方上的一些事情时，他严格遵照这样的原则：“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

在同旧日的通信中，给周世钊的最多，共选入10封，从谈诗谈词、酬唱奉和到研究历史唯物史学、探讨对受任新职的态度，既有对他从事教育工作的鼓励，也有对他接触实际的督促。这些书信，情意拳拳，不拘形迹，亲切感人。

建国以后，给党外民主人士的书信也很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这些书信有谈国家大事、方针政策，有谈理论观点、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还有关心他们身体、关心他们学习的。毛泽东注意将一些重要情况及时同他们通报，使他们的了解和支持党的政策，以增强党同他们合作共

事的基础。例如，当黄炎培收到江苏许多地向他告状的信后，毛泽东立即给他送去华东局关于镇反工作和土改工作的两个指示，并于1951年1月10日写信给当时的华东局负责人和苏南区党委负责人，让他们准备向将去苏南巡视的黄

炎培介绍全面情况。他积极支持和鼓励党外民主人士多到基层参观，通过接触群众、接触实际提高认识。1951年3月18日，他给几个中央局负责人的信中说：“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1950年和1951年，他两次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关心学生的健康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1951年2月17日给黄炎培的信，强调“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同时全面地论述了宽大与镇压的问题，指出“如同宽大无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这一重要论点。特别是1956年12月4日给黄炎培的信，根据党的八大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家内部的高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并在这个估计的基础上从全社会范围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重要思想。这些思想，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这一时期中，毛泽东在同党内负责同志的通信中，谈到各项重大方针政策的信件更多。例如：1949年11月14日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信，提出“要彻底民族政策的，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952年6月14日给周恩来的信，提出反对对干部子弟学校待遇的特殊化，要求“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1952年10月15日给谭震林的信，指出“今年征兵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大大减轻民负”；1958年1月12日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指出“一省一省，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要求省委领导同志亲自过问省报工作；同年10月11日给杨尚昆的信，肯定关于西医学中医学的建议，指出“中国医学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同年11月9日（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建议他们“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建设”来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使自已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同年12月22日给陆定一等的信，针对当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提出要“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1959年8月3日给刘少奇、周恩来等的信，建议在党内一律称同志；1964年9月27日给陆定一等的信，提出艺术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1964年12月14日给薄一波的信，赞成他关于川汉线的三条铁路都要同时同样进行实地勘察的建议，指出“资源、线路都要用两三年时间认真勘察，确有根据，才能比选，不可草率从事。也不可拖延延宕，不认真抓紧从事调查”；1965年7月18日给陆定一等信，指出画模特儿是绘画和雕塑的基本功，加以禁止是不妥当的等等。这些信件，对于指导实际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一时期中，反映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和活动的书信，比较集中在1961年。这一年一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重新提倡调查研究，这对于初步纠正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曾亲自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的农村进行调查，1月20日给田家英的信，反映了这次调查活动的情况。4月25日给邓小平的信，要求中央和各地领导同志，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等）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5月6日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夫到农村认真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写，不拘形迹”。5月14日给张平化的信中说：“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这一时期中，毛泽东有一些同百家学术、文化界著名人士和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同志的通信，谈到了他对学术、文化方面一些问题的看法。例如：1951年至1954年间给李达的三封信，就李达写的《〈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和两篇批判胡适的文章，特别指出，“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应加强这方面的宣传，“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党外都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有几封信是谈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方针的。1956年2月19日给刘少奇的信，针对一位苏联学者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提出了不同看法一事，指出“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是可以谈谈，无所谓损害威信”，“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1957年4月30日给胡乔木的信，建议人民日报转载李汝祺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他给李汝祺的文章挑了一个肯定的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并为人民日报代写了转载此文的编者按语。1958年7月28日给周谷城的信，对周谷城请他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一书写作的序说：“我对辩证法无所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应提出，可获谅解否？”在章士钊的旧著《逻辑指要》收入逻辑丛书出版时，毛泽东在1959年6月7日给他的信中，代他拟了一篇再版说明，说“近年来以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极大兴趣，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甚感趣味”，并欢迎在学术问题上“保卫正确论点，指出错误地方，导致真理日益明白”。1965年关于《兰亭序》真假的辩论中，他亲自写信给作为辩论一方的郭沫若，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支持发表高二适的跋议文章。（下转第四版）



△ 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彭真、万里、杨尚昆等同志参观毛泽东革命业绩纪念馆。



△ 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彭真等同志参观刘少奇革命业绩纪念馆。

本报记者 王景仁摄



△ 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彭真、习仲勋等同志参观周恩来革命业绩纪念馆。



△ 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彭真、杨尚昆等同志参观朱德革命业绩纪念馆。

王震在全国党校党史党建学术讨论会上讲话时指出

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是我党历史上光辉篇章

新华社长沙12月26日电 (记者刘诗训)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而举行的全国党校党史、党的建设学术讨论会今日在长沙闭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校校长王震在会上讲了话。他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毛泽东同志关于党的建设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要部分。他希望大家坚持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作出贡献。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王首道在会上作了题为《学习党的历史,加强党员思想教育》的长篇讲话。他联系当前正在开展的整党,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学习和了解党的历史。

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蒋南翔在会上作了《继承和发展延安整风的优良传统,搞好全面整党》的长篇讲话。他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创造的三条基本经验:改造党的学习,确定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解决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他在讲话中还说,要进一步加强党校的正规化建设,为搞好干部队伍第三梯队的建设,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作出贡献。

这次会议是由中央党校主持召开,于12月19日开幕的。中央党校,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校、部分地、市委党校,以及中共中央、国家机关、解放军的党史、党建教学,研究人员共340多人参加了大会。

王震会见法国客人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由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领导成员雅克·尚巴兹率领的法共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郝建秀会见意大利共青联盟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书记处书记马里齐奥·维奇率领的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代表团。

方毅会见杨振宁教授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国务委员方毅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杨振宁,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杨振宁是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来中国为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讲学的。

东在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草稿上加写的关于1946年以后一个时期土地改革工作经验的一段话;1951年3月27日《致李达》的注,介绍了毛泽东对李达《〈实践论〉解说》一篇的几处重要修改;1951年12月15日《致刘少奇》的注,介绍了党的历史文献中关于半工半农也是领导阶级这一提法的使用和修正的情况;1952年9月3日《致黄炎培》的注,介绍了毛泽东修改黄炎培一个讲话稿时阐述的对资本家进行教育和改造的一些重要思想;1959年6月7日《致章士钊》的注,介绍了章士钊记述的毛泽东关于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区别的一段谈话;1965年7月18日《致章士钊》的注,介绍了毛泽东在另一封信中对章士钊《柳文指要》的评价。这些注释,介绍了为了解和研究有关书信的内容所必需的、过去没有公开发过的一些历史文献,这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理论工作者和党史工作者,是会有帮助的。

中日青少年举行文体交流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日本学生书法、绘画、摄影作品展览今天上午午在民族文化宫开幕,展出1,300多件日本大、小学生的作品。这个展览是日方友好交流团组织的。这个访华团一行353人今天全部抵达北京,开始同中国青少年一道进行为期一周的友好交流活动。日本青少年友好交流访华团将在北京红塔礼堂举行演出,并同北京中学生进行排球等项目比赛。

南斯拉夫大提琴家戴什帕利在京演出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三十六岁的南斯拉夫大提琴演奏家瓦尔特·戴什帕利,今晚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访华首场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毛泽东书信选集》介绍

(上接第三版)毛泽东一方面坚持主张在学术研究中必须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方法,例如1950年8月29日给陈寄生的信中说“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另一方面他主张在具体的学术争论中,应当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些思想,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最后,谈一谈《书信选集》注释的情况。全书注释共九百余条。为写这些注释,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访问。注释大多比较简要,但有一部分注释有较重要的内容。例如:1944年1月14日《致彭德怀》的注,介绍了毛泽东在彭德怀一次讲话的记录稿上写的关于党和党的建设问题的一些重要观点;1950年6月4日《致刘少奇》的注,介绍了毛泽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各界人士瞻仰毛泽东同志遗容

(上接第一版)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王甫、王国权、王炳南、王淦昌、区棠亮、贝时璋、李荫冠、孔从洲、邓家泰、古耕虞、叶林、白寿彝、吕驥、刘大年、刘东生、刘达、刘伟、刘瑞龙、许杰、孙敬文、李一清、李贵、杨立功、吴世昌、吴仲华、吴茂荪、吴波、何美、谷景生、沈鸿、宋一平、宋劭文、宋承志、张友渔、张文裕、张杰、张贤诤、张秉贵、张承先、张珍、张致祥、陈宗基、陈鹤桥、武衡、林一山、林雨、欧阳毅、郑伯克、赵忠尧、郝德青、荣高棠、胡克实、胡绩伟、段苏权、洪丝织、宣乡、莫文骅、陈锦升、爱新觉罗·溥杰、高登榜、黄志刚、梅行、梅益、曹禺、符浩、章瑞英、彭迪先、董建华、韩哲一、曾涛、谢怀德、谢铁骊、楚图南、袁惟普、雷洁琼、熊复、潘焱、薛暮桥;全国政协常委委员 丁玲、千家驹、马信、马海德、王力、王匡、王序、王一帆、王玉清、王光美、王民仲、方荣欣、孔祥植、卢嘉锡、叶至善、叶笃义、叶恭绍、叶桔泉、叶道义、冯素陶、戎子和、吕东、庄明理、刘寅、刘鼎、刘元璋、刘亚雄、刘卓尔、汤蒂因、汤德全、安士伟、许志猛、许宝骙、孙孚凌、孙

事业千秋未有终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各界人士瞻仰毛泽东同志遗容侧记

本报记者 张述圣

我们正在走上和逐步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最好的历史时期。

这是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党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又在总结新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的日子里,全国人民都为此而感到无比欣慰。

12月26日上午9时,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彭真等来到毛主席纪念馆,瞻仰毛泽东同志遗容,参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革命业绩纪念馆,缅怀四位老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

在毛泽东纪念馆里,有一张1938年9月底到11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同志与在延安召开的党的扩大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的合影。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基本克服了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战略相持阶段的我党我军的方针任务。邓小平同志久久地站在这里,观看这张珍贵的照片。胡耀邦同志在一旁,向邓小平同志一一介绍合影上的人名。

1936年,美国进步作家斯诺到陕北访问,红军发给他一套军装。一次,他为毛泽东同志摄影时,把自己戴的红军帽给毛泽东戴上。摄影后,毛泽东将军帽还给斯诺。1975年10月邓颖超会见斯诺夫人时,斯诺夫人将这顶珍贵的红军帽赠给了中国。现在,这顶已经褪色的红军帽陈列在毛泽东纪念馆。长期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杨尚昆同志向胡耀邦同志作了介绍。

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革命业绩陈列室里,领导同志一边参观一边交谈,回顾自己跟随这四位老无产阶级革命家度过过的峥嵘岁月,心情无比激动。

那些长期跟随毛泽东同志南征北战的将军,那些长期与我党肝胆相照、合作共事的朋友,对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无比崇敬。他们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仍然拄着手杖,坐着轮椅,前来瞻仰毛泽东同志遗容。肖劲光、史良、许德珩、王昆仑、包尔汉、叶圣陶、赵朴初……,提前半个小时来到纪念馆。在休息室,肖劲光同志对记者说:“我十几岁在湖南参加革命。几十年来,一直在毛泽东同志的科学思想和革命精神的感染、熏陶和锤炼下成长。毛泽东同志对我的培养教育终生难忘。”

1933年从美国来到中国参加革命的卫生部顾问马海德同志,已在中国忘我地工作了50个春秋,这位具

有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的老同志,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同志有着由衷的钦佩和崇敬之情。他在参观了四个纪念馆之后激情满怀地

对记者说:“一个国家,有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了不起。可是,中国有四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康克清大姐,王光美同志,毛泽东同志的子女和亲属毛岸青、邵华、毛新宇、李娜,以及钱希均、毛远志、毛远青、刘松林……都在这一天来到了毛主席纪念馆。邵华同志向记者发表的谈话,表达了毛泽东同志亲人的共同心情。她说:“12月26日,是爸爸的90周年诞辰。进入12月以来,北京、长沙、延安等地相继开展各种纪念活动,今天又举行这样隆重的瞻仰仪式,我们作为他的亲人,心情格外激动。”她说:“我们感谢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爸爸的深切怀念。我们要继承爸爸的遗志,在各自的岗位上,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任务。”

上午,在刘少奇纪念馆里,王光美同志为黄文欢、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乔森潘副主席介绍了刘少奇同志的革命业绩,下午又陪莫尼公主参观。她说,刘少奇同志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物不多,但是,因为十年动乱中受审查,他的手稿和文献却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她指着刘少奇同志给毛泽东等同志的传阅信件对黄文欢同志说:“信中说的‘中越互派大使问题,同意越南派陈春风为大使’就是指您。您那时的名字叫陈春风。”黄文欢同志高兴地说:“是的。陈春风就是我。”

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荣高棠同志在参观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非常迅速的发展,这正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永远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创造性地工作,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

从长征时期就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杨尚昆同志看了纪录片《光辉永恒》和毛泽东纪念馆后对记者说:“这个影片和纪念馆,生动地记录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其他老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我党我军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时间虽短,展出的文献、实物和图片也不多,但是它很有教育意义。它可以使我们特别是青年人了解革命成果来之不易,可以使我们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为中国人民建立的伟大功勋。”

从清晨到傍晚,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首都各界人士、工农兵代表和少先队员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一批又一批来到毛主席纪念馆,瞻仰毛泽东同志遗容,表达他们对毛泽东同志深切怀念和无比崇敬的心情。

瞻仰活动结束了。最后一批人群走出了毛主席纪念馆。他们看到,宏伟壮观的天安门广场虽然寒风凛冽,天空却格外晴朗。

铮铮铁骨

记为端正党风而英勇斗争的共产党员高玉升

1983年9月2日晚8时许，河南省商丘市物资局储运公司共产党员高玉升在回家的路上，被一凶手暗害，光荣牺牲。（按：凶手已被依法处决。）

高玉升是商丘市物资局储运公司的业务股长，兼任农商联办货场主任。他每天接待一批一批的货主，经手成千上万吨货物。这些年来，党风不正，经济领域有些风气也不好。进入货场的大多是赊销物资。个别物欲横流的人总想在货场上打主意。去年春节临近，货场越发繁忙起来。一天，高玉升刚来到营业室，就有人向他建议：“高主任，春节快到了，咱们是不是花点钱，请一下有关单位，这对开展业务有好处！”

谁知，新上任的高主任一沉，坐下来郑重其事地说：“办好货场，靠什么？靠过硬的工作，靠信得过的声誉。请客送礼，一坑国家，二害自己，三伤同志，咱们不能靠它去搞工作。”第二天，老高便向大家宣布一条纪律：谁搞请客送礼，分文不给报销。

货场农方的两个负责人为了多拉业务，背着老高请了几个“关系户”一桌酒席，花了60多元钱要报销。由于老高坚决不同意，那两位负责人只好按规定掏了自己的腰包。

面对党内不正之风，高玉升总是挺身而出，无私无畏，从不象有些人那样，口头上表示反对，遇事就往后躲。

去年10月，地区副食品公司从外地购进50吨白糖，有两包烂了口，第二天就少了68斤。老高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有位好心人劝他说：“得罪人打墙墙，我看还是拉倒吧！”老高说：“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扎手也要管到底。”终于查出是值班人员又吃又拿造成的。老高一面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一面责令有关人员照章按价作了赔偿。

今年1月，一位货主找到高玉升，反映装卸工多收了装车费。又说：领导知道就是了，不必那么认真。高说：“对敲竹杠这种人呀，就是要认真。”有位队长为难地说：“钱都分到各手里了，收回难呀！”老高气愤地说：“谁也得收，这种歪风不刹不行。”

他和队长一起对装卸工们做思想工作，终于收回了多要的装车费，分文不少地退给了货主。

高玉升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赞扬，但也遭到那些侵害国家利益的犯罪分子的不信任和反对。

今年8月，农商联办货场货票员黄德强，在一次酒席上结识了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并把他一车皮柴杆计的提货票，私自交给了那个人。当货主来讨票准备提货时，被那个坏家伙敲诈勒索100元钱。高玉升听到反映之后，立即进行追查。有人劝他，老高，算了吧，黄德强蛮横粗野，别为这惹出事来。老高生气地说：“因为他厉害就不敢惹他，还有什么原则？”

高玉升掌握了确实证据以后，果断地令黄德强反省。哪知黄德强怀恨在心，向高玉升下了毒手。

高玉升1946年参加人民解放军，1948年入党，参加过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经历过淮海战役、渡江作战，抗美援朝时，跨过了鸭绿江，身上多处负伤，荣立过一、二、三等功。所有这些，他从来没给别人讲过，就连老婆、孩子都不知道，直到开追悼会时，人们才知道，他是位多次立功的好同志。

老高功劳大，资历长，但他从不以此向党伸手要官当，争级别，闹待遇，更不为了子女谋私利。

1974年，高玉升在市供销社生产门市部当主任时，一家老小7口人挤在两间房子里。供销社领导叫他找块地，要给他盖几间房子。爱人相中了仓库旁边的一块空地，催老高快盖。老高一本正经地说：“别胡扯了！咱盖、他盖，都这样去盖，不就乱了套！住得不宽绰，又不是谁家。”从此，爱人也就打消了盖房的念头。

老高的爱人一直是个临时工，后来临时工也被辞退了。他有一女四男，这几年一个个都长大了。

孩子们没个工作，家庭经济困难。老高常说：“拉关系、走后门，我不学，看不惯，也不想学。”直到他牺牲，几个孩子仍然在建筑队当临时工。

本报通讯员 李景亮 吕健 本报记者 李杰



“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谁也管不到底。”高玉升同志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几十年来，无论在烽火连天的战场，还是在经济建设的岗位，他总是危难时刻冲在前，坚持原则，不敷衍，有方便让别人，歪门邪道不沾边。这正是共产党员言行如一、无私无畏的表现。与此相比，那种见“扎手”就逃、见“便宜”就捞的人，能不感到羞愧、并认真改过吗？共产党员高玉升，铮铮铁骨，为人民利益而牺牲。他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上，并激励着人们前进！

找出差距 对症补课 彭县采取措施巩固整党成果

本报讯 中共四川彭县县委结合前一时期县机关整党试点点的实际，认真学习中央整党决定，着重找差距，对症补课，进一步巩固整党成果。

彭县县属机关整党试点在《决定》公布前结束，整党中产生的新的县委一班人，新老干部互相信任、配合，深入调查研究，领导方法、工作作风有较大转变。《决定》公布后，县委常委立即对照《决定》的要求，全面检查本县整党工作。他们认为，整党试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在提高思想觉悟和组织处理、清

理“三种人”等方面差距较大，应进行补课，而首先是要学好文件、提高认识。

为此，县委宣传部组织理论辅导，宣讲《决定》；县委党校举办学习班，培训骨干；县委要求各级党组织组织本单位党员干部，结合本支部实际找出存在的主要问题，边学边改，并将解决情况书面汇报；县委随时督促检查。在学习中，县委常委带头边学边改，遇事不软。今年10月征兵时，按规定，县城征应届高中毕业生，城镇征初中毕业生。有7名家住县城、初中毕业的干部、职工子弟要求将县城户口转

（一）整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1、为什么说尽管十年内乱使我们党受到了严重损害，党的队伍的主流仍然是纯洁的和具有强大战斗力的？
 - 2、为什么说我们党完全能够依靠本身的力量克服自己的阴暗面，纠正自己的错误，更加生气勃勃地前进？
 - 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为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了哪些工作和斗争？
 - 4、当前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会存在这些问题？
 - 5、我们党除了存在着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外，还有哪些方面同我们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不相适应？
 - 6、这次整党总的目的和要求是什么？
 - 7、为什么说这次整党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夺取新的伟大胜利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
- ### （二）整党的任务
- 8、这次整党的任务是什么？

争取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

广东省四十二个首批整党单位

抓住群众最关心问题马上整改

本报广州12月23日电 记者纪希晨、梁兆明报道：广东省42个首批整党单位，联系本单位存在的党风问题和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能解决的马上解决，能改的就先改，让党内外群众看到整改的实际成效，提高对整改的信心。

一些单位针对当前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会议多，文件多，表报多，电话多，汇报多的官僚主义作风，作出了改变“五多”的规定。鉴于元旦、春节期间最容易刮起请客送礼的不正之风，省委整党工作指导小组发出了严禁收受礼物的通知。有些单位对一些群众意见大的问题，及时作了处理。如有一个机关单位新建一幢宿舍，原计划分配给以上干部，党员学习整党文件中提高了思想认识，改为分配给离休干部和刚调来的干部居住。省直属文艺单位在学习中，联系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主动检查了过去在编辑、出版工作和创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

为何“拍案而起”

舒瑜



某单位一个领导人，对自己吃吃喝喝和多占住房问题，在在一次会上检查一番，表示“痛改前非”，并欢迎大家提意见，多帮助。既然领导愿意“纳谏”，有人就壮起胆子，据实提了几条意见，语气相当委婉。殊不知，话说到半截，这位领导骤然作色，拍案而起，连呼“岂有此理”！

同样的批评意见，自己讲可以，别人讲不行。何以如此？那是因为本人的“自我批评”不真诚。一是欺上，应付检查；二是对下，过关了事。



陈毅生前曾在自己的墨盒上篆刻了这样几句话，用以自勉：清招损，谦受益，莫伸手，终日乾乾，自强不息。

我增强了开创新局面的信心

北京市化工二厂厂长 王殿通



近几年我们化工二厂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正象中央整党《决定》指出的：现在，我们党除了存在着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外，在许多方面同我们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不相适应。结合我们厂和我个人的情况，我体会这个“不相适应”首先是思想上不相适应。在整党中，我们厂领导班子找出的思想上主要差距之一，是缺乏强烈的开创新局面的事业心、进取心，存在着“看摊守业”、“求稳怕乱”的思想。这一点在我的身上表现最为突出。我觉得自己58岁了，已经“超期服役”，守好摊子别出事就行了。因此，“见好就收”，标准不高，遇到困难便后退。我们领导班子通过亮思想、谈心互助，使我认识到“看摊守业”实质上是个人主义患得患失思想在作怪，考虑个人多，考虑党的事业少了。一个老同志曾提醒我：“你在离休之前，该考虑一下给化工二厂留下什么摊摊？”这对我的思想震动很大。我决心变“守”为“闯”。我们领导班子带领全厂制定了化工二厂到二十世纪末的长远发展规划；狠抓了人才开发，经过这些工作和我们厂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开创新局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学习整党文件，我增强了开创新局面的信心，进一步体会到这次整党，确实是实现二十大确定的宏伟目标的根本保证。

现是什么？

- 12、共产党员怎样做到自觉地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
- 13、为什么说我们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为什么要坚决反对对党员和党员干部利用职权和其他条件谋取私利？
- 14、为什么说党风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整顿作风包括哪些主要内容？
- 15、怎样认识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朽现象危害的严重性？《决定》对处理搞不正之风、谋取私利的党员和党员干部，作了哪些原则规定？
- 16、加强党的纪律着重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说保持党的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实现党的纲领和任务、提高党的战斗力的重要保证？
- 17、共产党员应该怎样为加强党的纪律而努力？
- 18、为什么要把纯洁组织作为这次整党的一个重要目的？为什么说清理“三种人”是纯洁组织的关键？
- 19、在清理“三种人”的问题上，《决定》作了哪些重要的原则性规定？（未完待续）

北京部队某团端正党风见成效 正派干部受重用 奸滑之人吃不开

本报讯 记者涂国之、通讯员尹向东、计国亚报道：北京部队某团新的领导班子在今年夏初上任后，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任用思想作风正派、有才干

的原六连连长朱大国，一贯廉洁奉公，工作出色，多次立功和受奖。团党委把他提升为掌管全团营房营具大权的营房股股长。朱大国上任就当“黑脸老包”，对公家的东西把得很紧，人称“朱大锁”。干部战士说：多些朱大国这样的干部，不正之风就没有市场了。

团党委对思想作风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的干部进行热情帮助教育，并对其中少数人采取了必要的组织措施。有个连队干部，过去对领导吹吹拍拍说假话，得以从战士提升为干部。此后，他根本不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前不久，团党委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将其免职，当兵锻炼半年，以观后效。这个团严肃处理作风不正的人，受到干部战士赞扬。

埋假丧 信鬼神 起纠纷 打烂坛罐罐



从四川乐山到洪雅县，一路上，听到人们用嘲笑而又气愤的口吻，谈论一家五党员鬼神，讲排场，不把乡政府放在眼里，闹得满城风雨的丑闻。人们说：这几个党员干部不象样子。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今年10月中旬，乐山地区化建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王炳和、乐山地委政研室研究员田三等七人，其中有五名共产党员，回到洪雅县老家为母亲祝寿。真是人有旦夕祸福，当天王的母亲不幸辞世，生日变成丧日。王炳和等请来“阴阳先生”胡说些什么王的母亲生时死在一天，犯了“重丧”，必须埋假丧，不然还有灾祸。王炳和等信以为真，请人钉假棺，里面放木

悄悄把它埋在大路边邻居的菜地里。

次日清晨，邻居发现菜地有香烛纸灰，还有新挖的土痕，知道是王炳和家埋假丧，于是要他们把假丧挖走。王炳和、田三等先是否认，继而支吾其词，邻居要拉他们到乡政府讲理，他们说：“你没有资格！”邻居一气之下，把王炳和家的锅碗碎、桌子打烂。

话分两头。王炳和的母亲去世后，他叫人开着公家的车到处接亲友，大摆排场。送葬之日，道土开路，披麻戴孝，端灵牌，绕道而行，闹得乡里乌烟瘴气。

王炳和、田三等被叫到乡政府里，他们嫌那里凳子脏，垫着手巾才坐。乡政府、派出所批评他们搞封建迷信不对，叫写检讨，他们声称“没有时间”。他们还说乡里的公章是“玉米蛇乾”，不值什么。态度傲慢之至。王炳和、田三等身为共产党员，而且担任领导职务，他们所在单位党组织应严肃处理才好。这是洪雅县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呼声。

本报记者 吴学林 罗茂城

在地方党刊上

▲安徽《党员生活》1983年第10期，介绍了马鞍山发电厂党委端正党风的事迹。

一、党委成员住房与职工一样，招工不走后门，拿全厂最低等的奖金。二、近几年来提升的2名处级干部和20名科级干部，都是由基层推荐，组织部门考核，提交党委讨论通过的。三、个人不批条子、不挪用公款。

▲甘肃《党的建设》1983年第10期发表临泽县“党员联系户”活动的调查，该县这方面工作做得较好：一、使党员认识到加强思想工作中的责任；二、把这一活动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来；三、党员与联系户平等；四、在劳动中进行思想工作和接受监督；五、加强领导。

▲四川《支部生活》1983年第12期发表《杨尚昆同志谈吴老》的专访。杨尚昆同志说，吴玉章同志是我们党内的一位长者，是中国革命的老前辈。他的一生，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贡献很大，有巨大功劳。但他生活上十分艰苦朴素，解放后进了城也同样如此，连一只鸡也舍不得吃。杨尚昆同志称赞吴老说：“这是一位多么好的老人啊！”

▲山东《支部生活》1983年第9期报道，临胸县委书记王汉兴帮助柳山公社庙山大队女青年张玉铃学技术，受到人们的赞扬。

▲湖北《党员生活》1983年第10期报道，湖北省第一探矿工程大队原纪委副书记安寿奎，贪污公款6,500多元，被判刑五年，党组织已开除其党籍。



